

教育家

顾怡生诗文选集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教 育 家
顾 怡 生 诗 文 选 集

陆文蔚

顾乃健 搜集整理

邢家璜

(苏)新登字006号

教育家顾怡生诗文选集

陆文蔚 顾乃健 邢家璜搜集整理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1168×850 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7 字数 170,000

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 册

ISBN7-80519-331-Z/I·71 定价: 4.00元

责任编辑 朱野坪



顾怡生先生像

此間天宇似寥廓
尔我都成不繫舟
中夜風狂愁月碩
詰朝雪起駭山
流潛魚飛鳥天殊
趣老竹寒松意
未秋今日艱難來
日甚及時絃誦
共追求 在儕松贈諾師友詩

顧
毅



顾怡生先生晚年墨迹（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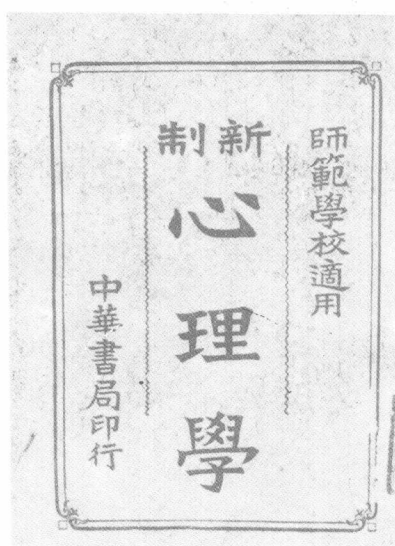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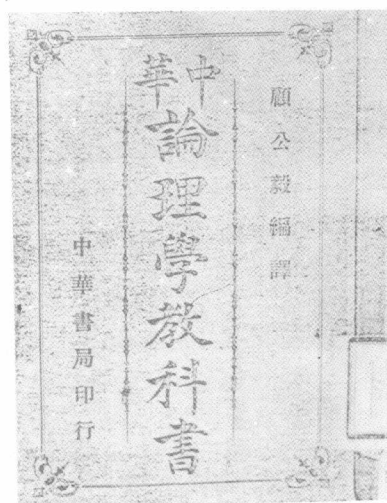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七年松慶

積年有史誇前盛松慶剛逢卅五回
入中宮牆舊依地待陰紅檜樂新塔
成因毀政國時運改以先傷冀眾才
抃舞高歌足今日和聲空際尚為雷

石坡

私立通州師範學校文藝研究會贈品

顧怡生先生晚年墨迹（二）



顾怡生教育专著
论理学—1912年
心理学—1915年

殷、姚、李、通、子、孫、東、魯、石、碑、一、位、前
 冰、雪、多、方、六、解、凍、門、牆、瓦、紋、之、於
 崇、山、公、前、挂、好、重、疑、洪、之、出、似
 正、宗、中、子、子、胡、夕、李、子、山、水、深、源
 集、風

怡生先生七十在及門弟子下蹟出以生乎
 事業是告以詩以壽

郭沫若

郭沫若賀詩手迹

南 园 记 (代序)

——为怀念顾怡老及民元烈士作

李 俊 民

1991年2月24日是顾民元牺牲50周年纪念日。不久前有人问及烈士的故居，不由勾引起我种种遥远的记忆和对烈士由衷的怀念之情。

顾民元生于1912年，亦即民国元年，故名民元。他是南通著名教育家顾怡生的独生儿子，诞生于南通城南父母的住宅——我谓之“南园”。顾民元不仅生长于此，也曾留下从事革命活动的种种足迹于此，因而这个故居对纪念烈士来说，是有深刻意义的。

我于1918年夏进入南通城，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七中学（南通中学的前身）。每逢星期天，我必去城南看望我的嫡亲姑母和姑丈顾怡生的。他们的居处叫城南马家桥顾宅。这个住宅在一块庄稼地中间，以本城居民看来，正是半村半郭、风景宜人的地方，所以我把它叫做“南园”。这块庄稼地处于一死角，人迹罕至，顾宅居中，成为一个“回”字形。从现在的“南公园”向东南望去，隔着一条宽阔的濠河，就不难发现它。顾怡生是张謇的得意门生。亲近张謇的不少人夤缘财势，扩

大居处，“肯堂肯构”，务求华丽；惟有顾怡生保持贫寒出身的书生本色，不伎不求，清廉自守。

他的居所约平房十间。正面四间低平瓦房，中间是一个小小的厅堂，东侧为怡生先生的父亲少轩公居室。他也是文士，以经籍授徒。此公喜爱金石，饶有雅趣，但耽溺于酒，中年因酒醉中风而至瘫痪，卧床不起，怡生先生专门雇人料理他的生活，外人不常见，我也不能常见。堂屋西侧是两套间，玻窗南向，窗明几净，是姑父、姑母起居所在，儿女都同此一室。我姑母出身寒门，略通文墨，勤敏干练，经纪家事，使姑丈无须分心，一生从事他的教育工作。正房前是天井，规模不大。怡生先生的叔父晓岗公是农校的职员，喜蒔花木盆景，在天井中略加点缀，有长青松柏，间以春梅、海棠、红枫之类，正是具有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”的意趣。天井西侧两间平房，旁有后门，屋后有一古井，为顾家与另一户农家共用。天井东侧三间平房，北边一间是厨房，居中间有时会客，有时也作孩子的书房，南边一间是大门。大门面临小河，沿河向北有座石砌小桥，人称马家桥。从小桥南望，是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一片景色。大门向南没有路，但沿河有小蹊径，再向南约二三十步，却是一片大竹林。此处更值得一提，对民元和我来说，这里是我们的自由天地。

1919年，我才读中学一年级下学期，“五四”运动爆发了。民元此时才进入小学不久。在他入学前，姑父已经为他讲授了《诗经》、唐诗、简短的古文篇章，他的文化程度超过了一般同学，加以他天资特别聪颖，所以当时有“神童”之目。“五四”初期上海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刘延陵来到南通，特别向他灌输文学知识，而后民元和小同学施春瘦（史白）、理朴（中

学理化教师李弁都之子)就在小学里办起刊物来。我记忆中这个刊物叫《月潮》。可以说,民元的知识启蒙,是和新文化的诞生同时,民元是“五四”的产儿。

1922年夏,我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。那时运动已过,但新文化方兴未艾,南通老文人势力较大,新思潮发展较慢,但外省来通就学的思想较为活跃。我就注意联系外省学生,那时从西方涌进来的思潮很复杂,一时莫衷一是。最显目的,如医科的湖南平江人陈世我(运培),他宣传无政府主义、无政府工团主义,向我们介绍巴枯林、克鲁泡特金的学说;纺织校同学陕西人胡超吾(鍾灿),他比我高一级,则倾向于马克思主义;农校的安徽舒城人倪超凡,则爱好文学理论和创作。他们都是我的朋友,我同时也把他们介绍给民元表弟。这些人意见不一致,碰在一起就辩论不休,有时辩论就是在那竹林中展开的。

陈世我重感情,对我和民元特别好,因而对我们产生了一点影响。但他否定一切权力,虽然对现实不满,力求反抗,但陷于无组织状态,一事无成。后来听说要逮捕他,他离开南通,去向不明。胡超吾有两个朋友,一是他的同乡屈武,一是河南郑州人武止戈,他们往来信件不绝,集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。1923年的“二·七”惨案,使我震动,我憧憬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,向往着去武汉上学。以后我转学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,就是胡超吾介绍的。可是后来胡有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则无从查考。纺校另一同学江西人邱会培,则是较早的中共党员。我之所以谈这些情况,是说明我和民元的关系不可分离,他比我小7岁,但对政治的敏感,则不下于我。

就在这片竹林之中，民元从儿童渐渐进入到少年。他在这里邀集朋友，谈论国家大事，交流思想，传播“禁书”，秘密集会，开展群众性的活动。他每进一步，就留下在这一竹林中的足迹。

从1923到1927年，我在武昌生活四年多，这时除寒暑假外，和民元的接触比较少了。我于1925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，1926年夏（北伐前）被直系军阀逮捕（当时被称为“中华大学事件”），被拘留过三个星期，这对民元很有影响，他不是害怕而是羡慕。这时年龄在我与民元之间的刘瑞龙同志，他也是我的同学表弟，瑞龙的母亲和姑母是姊妹，瑞龙是民元的姨兄，他进入了南通师范学校，也投入了革命。瑞龙同志是着重实践的政治家，他认真地深入到工厂、农村，和工人、农民结合，并注重做调查研究，爱作记录，记录得又快又详细，还是用的蝇头小楷。他做记录的本事真大。他对恽代英极其崇拜，他有一位表姐叫葛季膺（葛松庭的妹妹）是恽代英弟弟恽代贤（子居）的爱人，早年的共产党员。他和民元的关系，当然密切，相互影响也较大。1927年瑞龙介绍民元参加了党，当时瑞龙不过十七八岁，而民元却只有十五岁。1927年夏，汪精卫继蒋介石宣布反共，延展了大屠杀的白色恐怖的局势。这年秋末，我从武汉回到南通家乡，见到许多同志，其中包括瑞龙和民元。反共的气焰越来越嚣张，南通党的发展反而加快了。

1928年春节后，姑丈介绍我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去代课。不到两个月，女师当局害怕我宣传“赤化”，我便被辞退了，到狼山脚下去隐蔽，顺便做点工作。我在南通的名气大，后来站脚不住，我便到上海找田汉，住在“南国艺术学院”一段时间。同年初夏，中共南通县委在博物院开会，被人告密，

县委书记彭宏章、组织部长徐秋生、通师学生刘瑞龙、丁璠和女师支书汪钦曾(汪葵子, 我的爱人)、袁佩玖(叔平)等人被捕了, 南通的党组织于此中断。他们被押送南京, 经审讯后, 刘瑞龙、汪钦曾因证据不足, 无罪释放后回到上海, 彭宏章、徐秋生被判刑。

南通党组织失散, 民元于秋初来到上海, 找到了我。我介绍他和我的一位武昌同学张汝洛(一林, 安徽霍邱人)住在一起。这时为寻求生活出路, 计划集体写作, 组织了一个“同轨社”, 暗示与党同轨迹。后来他同张一林合写了一本书, 即《同轨》, 在上海的“泰东书局”出版。民元写了一篇以农民暴动为题材的小说《东方的太阳》, 和我在《跋涉的人们》当中所写的《蜕化》相似。同年秋天, 民元和汪钦曾都进入了彭康、李初黎等筹办的“上海艺术大学”, 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。但好景不长, 未满一学期, 上海艺术大学被封, 彭康、李初黎等被捕, 该校的党组织也失散了。影响所及, 连我所在的弄堂党支部书记也失踪了, 我的党组织关系同时也丢失了, 以后再没有联系上。

此后, 我的表妹顾民豫出嫁给泰州人景幼南(昌极), 景是南京大学毕业生, 他研究印度哲学和因明学, 这一年他赴成都大学教书, 民元因为失学, 思量继续进修, 决定去成都大学学习, 就随着姊姊和姊夫去四川。在大学里, 他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素质, 专心学习英文, 他在业余翻译了俄国十八、九世纪的著名小说和戏剧, 一口气译了好几部, 可惜这些大部分是耿济之等人翻译过的, 不能出版。他兼攻中国古典文学, 有时也自作古典诗词, 他的诗词受到纳兰性德、龚自珍以及近代诗人苏曼殊的影响, 所作清新淡远而稍带消极

气氛，耐人吟味。译作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法国的寓言故事《雄鸡的故事》，过去存有原稿，现在不知还存在否。可惜他写作勤奋，而存留很少。他一生从事革命，文学不是他的专业，姑且不论。

1932年，他已随姊姊、姊夫回到南通，在他外出教书期间，家中却遭到惨变。

起因是我的六弟李守淦(改名徐建楼)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在校外发放传单，不幸被发觉遭逮捕，经审讯后判处徒刑，收留在监。后因在狱中生病，经家中请求临时出狱到 hospital 治疗，临时保释的担保人是姑丈顾怡生、从兄李也三、叔父李子松3人。六弟在医院中病势减退，他仍旧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，恰好我寄给他一点钱，他得了钱就潜逃去上海继续工作了。这件事使得反动当局恼羞成怒，声言要逮捕保人归案。无可奈何，我父亲嘱我的二哥去自首，顶替叔父李子松寄押在监。姑丈和从兄李也三以外出寻人为名，暂避风头。他们到了山东济南，当时我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，我把他们留住在我的家中。姑丈旅外客居，心情较为平静。当时我的内兄汪钦墉也在济南高中任体育教员，他陪伴他们去千佛山、大明湖等地游览，姑丈高兴地写了《济南杂诗》若干首。

正在这时，我突然接到电报，说父亲病危，要我急速回家。我只好向学校请了假，即日起回南通。到南通时，先去城南看望姑母，看到只有姑母与表妹两人在家，一片凄凉景象。其时表妹睡在母亲床上，蚊帐低垂，只听得表妹在嘤嘤哭泣，姑母垂泪不语。当时我因父亲正在死亡线上，而姑家因我家牵累落到如此地步，不禁也抽泣不已。一直到我告别姑母要赶回乡下去看父亲时，表妹的哭泣也一直没有停止。

我到自己的家中才只一天，第二天晚饭时我叔父李子松突然告诉我，表妹已经坠井而死。这等于一声霹雳，把我震得几乎眩晕，目瞪口呆，无限惋惜。

我姑母所生二女一子。长女民见，未成年因病夭亡。次女民豫天生美质，端丽自喜。虽聪敏过人而性情内向，不轻言笑，其思想意向，人莫能测。她的哭声隐约还在我的耳边，但不知她的哭泣究竟为了何事。事后约略知道：她的丈夫景幼南看到当时顾家是“是非之地”，觉得民豫在家中很不安全，力劝民豫去泰州婆家，否则去南京卜居也可。民豫则以为家有患难，父亲不在家，无论如何，必须在家中陪伴母亲。姑母想到女儿是嫁出的人，也只好劝女儿离家。民豫根据她自己的经历，最害怕封建大家庭中的猥琐礼节，她受不住这种折磨。他也不愿意人家看她成为“金屋藏娇”的娇女，她抵死不肯离家。她丈夫不予谅解，所以她的哭泣是撕断灵魂的哀诉，不同于一般夫妇反目。可以证明，他俩在成都时，离开大家庭，夫妇的关系是比较好的。

姑母在夜间梦醒以后，发现女儿不见了，急得唤起邻舍四处寻找，问及她可能走动的亲友家，也无踪迹。附近的濠河风大浪急，叫唤不见人影。惊疑未定之际，方才想起自家屋后的簪井，经人探测，发现人在井中。赶忙打捞的时候，怪异的是，她不是头朝下，足向上，而是有如僧尼打禅，盘膝趺坐，出水时控出腹水不多，为窒息而死的。停尸待敛之时，姑母端详遗容，见面色光洁，栩栩如生，庄严娟秀，有如碾玉观音，人间少见。她在断肠之中，忽然引起幻觉，认为女儿已登仙成佛，聊以自慰。实际上他惯见女儿平日戚戚寡欢，蹙眉疾额，竟不识女儿的真正面目，在妇女中实在不多见。

民元的死，不能排除民元和我们表兄弟给予她的思想影响。但是她是一个弱女子，又不甘心为封建礼教所征服，矛盾与冲突在此，别无其他解释。

姑丈回到家中，他承受的打击可以想见。他在济南游大明湖时，有文人称大明湖为“明漪”，“明漪”与民元谐音，他想到女儿在家中，又怎么会料想到如此的结果！

1933年到1935年，民元往淮阴省立师范去教书，他利用语文教学以传播进步思想。他在南通中学当学生时，同学好友江上青（扬州人），与他年相若，道相似，趋向相同，以此亲密无间，有如兄弟。后来民元又介绍上青和当时著名的语文教师于在春相识，他们组织筹备了一个进步的文化刊物《写作与阅读》，和上海的进步书店“新知书店”联系，作为期刊出版。这个刊物对全国的中学、师范的语文教师发生很大的影响。“新知书店”即“三联”书店的前身之一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地下的出版社之一。1935年后，由于山东学生中间进步势力较大，山东省立师范和中学校长们到我处登门请求介绍进步教师，我介绍民元到省立第一师范来教国文，使民元又得到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会，一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，民元都在济南。

《写作与阅读》以于在春、江上青、顾民元、江树峰等人组成编委会，他们只能利用寒暑假，所以集中的机会少，分工编辑的时间多。姑父、母为了替民元完婚，在老屋后西侧建起一幢新房。新房屋基较老房高一些，面向东，屋前空出一个狭小的天井，民元的编写工作就在这里，编委们有时在这里会合。江树峰系上青的胞弟，新四军东进后，曾在苏中四专署担任过文教科长。

1937年“8·13”事变发生后，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淞沪。这时民元也从淮阴回到家中，我也已回到南通住在城内我的岳父汪老家中。由于国势危殆，民元、史白、马一行和我常在一起，商量如果日军侵入江北，我们要做些抗日准备。其时江南已经非常混乱，南通风声也很紧张，南通中学校长冯月君看到形势不妙，捲款潜逃，学校停课。民元趁此机会，为培养抗日青年起见，计划恢复通中。他利用顾老在教育界的威望，奔走于南通、南京之间，当时南京更是一片混乱，然民元恢复南通中学的计划终究得以实现。民元结集了钱素凡、马一行、吴天石和我以及通中应届毕业的进步学生姚溱、杜诺(成云)等，共商学校的恢复事宜。1938年初，以顾民元为校长的通中开学了，计划办成一个抗日的学校。但开学未及两月，日寇偷袭南通城，国民党军政人员，一枪不发逃之夭夭，学校解散，我们也只好转移乡下。一两个月后，国民党政府逃散人员集中到金沙，挂起了抗日的招牌，恢复办公。同时也搜集游兵散勇，组成保安队伍，实际上都是搜刮民财，毫无抗日诚意。当时，上海党组织为了扩大抗日力量，派遣“江北特委”吴佐成、唐守愚、洪泽、陈伟达等同志先后到了金沙。第一位到南通的是吴佐成。吴来金沙时，人生地疏，他结识了民元，民元向他介绍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吴和我的六弟徐建楼在上海提篮桥同过监狱生活，所以与我是一见如故的。民元同吴佐成结识的情况，我不了解。我和唐守愚是在山东济南见过面的，心知他们是党的地下工作者。

这时候，原国民党江苏省第四专员督察公署一个特务处主任，他也下乡，组织队伍，他倒希望组成一支能够打鬼子